

专家视点

观点荟萃

防止私人财产征收征用中的“公共利益泛化”

王涌

目前，一些地方房屋拆迁通常冠以“公共利益”之名，大量利用不纯粹的甚至虚假的“公共利益”侵犯公民私有财产的事例频繁发生。如何解决私人财产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泛化”问题？我们认为，征收行为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基础，并且应当从《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公共利益”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标准。第一，征收行为是必需的，应当从不实施财产剥夺行为将会产生不利后果和有没有替代方法两个方面把握。第二，征收行为必须符合合理性原则，这需要比较几种征收方案可能对被征收人造成的损失，从中选择对被征收人损害最小的方案作为征收方案。第三，征收要产生正面效益，并保证当地社会公众从中受益。在征收过程中，只有征收行为所产生的收益远大于付出的成本，并且这种收益是通过征收所产生的重组和整体化效应所带来，而不是通过压低征收补偿金、掠夺被征收人而得时，征收行为才被具有正面经济效益。而检验社会公众是否从财产征收行为中获益的标准是检验征收的目的是否纯粹为了提供公共产品，社会公众是否具有获取财产征收行为所带来社会利益的平等机会。第四，必须对被征收人进行公平的补偿，这是征收行为的必要条件，只有得到公平补偿的征收才是合理的。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私人财产保护法律制度研究”负责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构建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保障体系

王芳

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已经成为食品安全源头治理的重中之重。构建中国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需要在以下方面着力：一是构建基于供应链制度下农产品产业链利益相关方互惠联盟的激励约束和反馈机制；二是建立我国横向监管执法部门间、纵向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协调联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预警、快速反应及风险评估系统；三是制定利益相关方积极参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行动计划；四是构建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要素高效运作的长效机制，从顶层设计上确立“有限政府”的制度，应用新公共管理理论突破无限责任的困境；五是强化风险交流机制，采取积极的政府公共关系施政理念，应对各方质疑和要求；六是构建全国统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框架，厘清长期存在的交叉、不一致问题，弥补具有发展优势品种的标准短缺问题，与认证体系相结合，提升标准化运作的实效性；七是构建全国层次清晰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建立督促基层队伍发展的激励机制，为监测信息平台搭建良好的数据和工作支撑；八是建立全国统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工作制度，加大追溯的编码技术、电子识别技术及电子标签技术等投入力度，形成职责清晰、分工协作、合力推进的工作体系；九是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技支撑体系的常态化支持制度，夯实监管基础，突破监管盲区，实现全球化统一规制的科学监管要求。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农产品安全保障体系研究”负责人、中国农科院副研究员）

实践是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方法

郭大俊

社会主义本质的演变，经历了一个从书本到实践，又从实践到书本，再从书本到实践的过程。这一过程说明，从人们当前的实践中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正确方法。第一，从社会主义实践的自身特点出发。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它不同于资本主义，也有别于未来的共产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表现出一些不同特点。而且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面临的任务不同，对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又会表现出一些具体的特点。因此，在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时，首先应立足于认清本国国情。第二，从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特点出发。历史是作为过程而存在的。社会主义是整个共产主义的初级形态，而社会主义本身又需经历若干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就会有不同的特点，如果人们的认识超越或者落后于社会发展阶段，抑或用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定取代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都不可能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点，在实践中就可能造成某些超越阶段的错误做法，直接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第三，从社会主义实践的总的联系出发。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它和资本主义、在有的国家甚至和封建主义，和整个世界的演变，都有相关的联系。就社会主义实践本身而言，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已经存在将近100年了，而在此之前社会主义的思想巨匠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征也进行了种种探索，现实的社会主义是从以往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来的，与以往的社会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探讨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时，应从历史联系和世界联系中去思考，应具有世界眼光和历史眼光。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科学社会主义”负责人、湖北大学教授）

陈晓明

人文文化与文化高品质发展论略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号角，体现出执政党以前所未有的姿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这样的历史机遇面前，思考人文文化的意义与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

下，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崭新历史纪元，改革开放的历史抉择使中国迈步走向现代化。进入21世纪，中国更是以豪迈的信心走向新的历史阶段。现在，中国要真正完成伟大复兴，民族文化传承和当代文化价值创新是不可或缺的根基。作为一个大国，在文化上应该有自己的根基，有自己厚重的历史文化，同时要有当代文化的创新性，对世界当代文化价值的建构作出责无旁贷的卓越贡献。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是一项极其艰巨和深远的工作，应当体现真实性和实践性。真实性是说它要有实际的效果，不是死传统，不是一些书本、教材和教条，而是活的传统，能在当下的文化与价值建构中起到作用。因而它的真实性依赖于它的实践性，只有在实践中，在与当今世界各种文化文明对话碰撞中，在参与当下各项文化建设的活动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才能释放出它的生命力，才能在当代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文化创新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国家应依托大学的教育和研究，加大对人文文化研究的投入。现在国家支持的一些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以实用性为主。但着眼未来，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更需要个性鲜明的研究项目以鼓励人文文化的创造性思维，给予大学思想文化创新以更大空间，这其实是关系到人文文化是否有真正创造性的重要问题；大学要加强人文素质教育，不断提升人文文化的地位，增强青年一代的文化修养。

二

认识人文文化在文化建构中的价值底蕴作用，才能使文化的发展繁荣有内在品质和长远方向。今天我们强调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强调人文文化价值底蕴的建设显得同样重要。从根本上来说，文化的发展繁荣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的必然要求，是增强民族精神凝聚力、向心力的迫切需要。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主要存在于它的典籍和经典作品中，如何把传统资源转化到当代大众文化中，转化到新兴艺术创作中，转化到新兴电子媒介文化中，是一个需要当代每一位文化工作者都细细考量的问题。今天

三

的大众消费文化虽然营造出个热闹的市场，但其总体品质有待提高，精品佳作较为匮乏。走向市场的文化繁荣，要使自己富有价值底蕴和美学品质，需要有人文文化作根基。

在今日社会，当网游市场里闪现着刀光剑影时，如何更好地关注参与者的心灵健康？当古典艺术作品在拍卖市场上拍出天价时，是不是还有人关注那些点线艺术和黑白意趣？当影像扑面而来的声色光电震撼感官时，人们是否还在关心精神升华？在我们今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背景下，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这种关注本身就表明娱乐文化和消费文化也要有人文精神，更进一步说，这些消费文化要适当吸取人文文化作为价值底蕴，同时创造出新型的人文文化。这样的人文文化虽然不再是传统典籍，而是内含在当代新艺术和新创意文化中的思想火花或精神内核，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的文化价值底蕴建设，需要经过长期潜移默化而形成，是一个时代文化合力作用的结果。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精品，为后人留下这个时代的经典，就必然要与人文传统接轨，同时，也必然在体现时代精神的同时，创造当代新的人文价值。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问题得以解决之后，精神生活方面必然会提出更高要求。很多社会矛盾，尤其是人们更高的精神和价值方面的要求，仅仅通过法制还难以解决，只有具备健康深厚的人文文化底蕴，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文化才不会出大问题，人们才会拥有更好的精神家园，社会才会更加和谐稳定。

今天我们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只是促进文化产业的GDP增长，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华文化的整体水平，尤其是提升中华文化面向世界的影响力。在这一意义上，推进文化向高品质方向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如果文化繁荣发展只是一些低水平的文化产业和娱乐文化大行其道，虽然也能带来经济上的成功，但根本上成不了大气候，不能使中华民族在21世纪对人类有较大贡献。

提升文化发展的品质，重要的当然是它的创

新性，而如前所述，创新性离不开人文文化的根基，没有人文根基，创新性便没有持续的原动力。提升文化发展的品质就是指提升具有本民族传统内涵的、具有世界性面向的、能引领人类积极向上并开创未来的文化。如此看来，提升文化发展的品质不但是回到高雅文化的老生常谈，也不是要制造一批阳春白雪，根本的要义在于：这样的高品质是能为人类普遍认识和接受，与人类历史中的积极力量一脉相承的那种价值。提升文化发展的品质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更为广泛的体现，它以实践形态的丰富性和多样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落到实处。

文化的发展应该具有世界面向。它能最广泛吸收人类已经取得的优秀文化成果，能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融会贯通，自成一格，气象更新，能够海纳百川。强大的有创造性的文化总是兼容并蓄的文化，世界性面向就是一种在最大可能的包容中创造自身的能力，这样的文化才能影响世界、引领世界。

文化的发展应该具有未来开创性。文化的高品质发展决不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而是不断开拓进取。当今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正是因为不断开拓进取，才有现在的进步强盛。历史给予中华民族新的机遇，就看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有没有能力抓住机遇，开创中华民族的未来，增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只有能为人类开辟前进道路的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领着世界走，而不是被世界拖着走。

文化的发展应该能为全体人民共享。文化是人民共同创造，当然也应当使人民共同分享。文化的高品质发展不是高高在上的，而应使人们心悦诚服、自觉向往、自觉承担。文化的高品质发展可以存在于大中小学的经典人文教育中，可以在大众娱乐文化中随时显现，也会在人们的日常交往中随处体现。

总之，今天中华民族面临新的历史机遇，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一项责任的召唤，切不可弄成急功近利的文化大跃进，而是要真正从中华民族的自我塑造和面向未来的责任担当着眼，这才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意义所在。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与当代文化建设研究”首席专家、北京大学教授）

刘海涛

跨学科研究

计量语言学：语言研究的科学化途径

编者按

为贯彻落实中央有关精神，适应当代学术发展潮流，去年以来，国家社科基金设立一批重大招标项目，对跨学科研究进行专项资助。为进一步推介学界跨学科研究成果，本专刊自即日起开辟“跨学科研究”专栏，以飨读者。

长久以来，语言研究的科学化一直是现代语言学家的主要努力方向与重要目标。

现代自然科学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可验证的结论、精确的预测能力以及丰富的实际应用。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各种实验方法与恰当的模式来获得。因此，测量方法与实验手段的改进是自然科学理论发展的基本保证，其中计量与测量又是其基本操作。然而，在人文社科领域，除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外，计量手段却用得很少。如果计量手段是一门学科科学化的有效方法，那么，在语言学中引入计量方法可能是语言学科学化的必要途径。

1935年，美国语言学家齐普夫有关语言统计的著作出版。这标志着一个新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和一种新的语言研究方法的诞生。齐普夫认为利用统计方法可以定量研究语言中的各种现象，这样语言学便可成为一门精确的科学。齐普夫这本书的标题“语言的心理学”表达了结合人类的经验与功能来研究语言的愿望，书的副标题“动态语文学”则强调了这种方法与其他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研究采用的是真实的语言样本。齐普夫所倡导的这种用精确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结构与发展规律的学科，今天称之为“计量语言学”。大量真实的

语言行为数据可以反映语言结构及其相互关系遵循着某些普遍的规律，这些规律正如那些众所周知的自然科学规律一样，可以用严格的数学形式来表达。计量语言学的目的就是揭示这些语言现象之间的关系，系统地描述并用公式化的定律来解释这些现象。

20世纪70年代之后，有不少语言学家开始使用数学方法来进行语言规律的探索，计量语言学在德语和东欧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目前这一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大多来自德国、奥地利及东欧国家，其中最著名的是德国波鸿大学的阿尔特曼教授。他在计量语言学的诸多领域均有重要贡献，是齐普夫之后最重要的计量语言学家，被誉为现代计量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另外一位重量级人物是特里尔大学的科勒教授，现任国际计量语言学学会会长与会刊《计量语言学》主编。

然而，计量语言学研究不只是以上国家和地区的一个局部现象，其研究方法正被许多国家的学者用来精确地探求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国外语言学家已对多种语言进行了多层次、全方位的计量研究，发现了许多语言系统的结构与演化规律。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人类对语言系统的精确认识，加深了对人的认知机理的理解，也极大地提升了语言学研究的科学价值。

从学科的特点和地位来看，计量语言学不同于一般的采用代数、集合、逻辑等方法对语言的结构特征进行（静态）定性描述的形式语言学，也不同于通过语料库来研究语言结构与使用的语料库语言学。计量语言学关注的是语言的定量特征以及这些特征之间的协同关系。因此，计量语言学与其他语言学分支的差别主要是方法上的差别。采用从真实文本中抽象出的数量关系，描述与理解语言系统及其组成成分的发展与运作规律是计量语言学的根本任务。“精确、真实、动态”是计量语言学研究的三大特点。计量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种生物—认知现象，也是一种心理—社会现象。语言系统是一个自组织、自适应的动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计量语言学研

究涉及语言学、数学、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物理学、系统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是一个典型的文理交叉学科，具有鲜明的跨学科研究特质。这些特点使计量语言学成为语言学诸多分支中最具现代科学特点的一个研究领域，而它所发现的语言规律也有助于更精确地描写与解释相应的语言现象。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各国计量语言学学者已经发现了不少具有普适性的计量语言学定律。这些定律可以分为三类：分布定律、函数定律、演化定律。齐普夫定律、门策拉—阿尔特曼定律、皮奥特洛夫斯基—阿尔特曼定律分别是这三类定律的代表。

（1）齐普夫定律：20世纪20年代，哈佛大学的语言学家齐普夫在研究人类语言的真实文本时，发现词出现的频数与其频数之间存在反比例关系，这一关系后来被称为齐普夫定律。齐普夫定律是计量语言学最早提出的统计规律之一，也是一个在计量语言学中具有核心地位、与诸多语言性质和语言过程密切相关的语言规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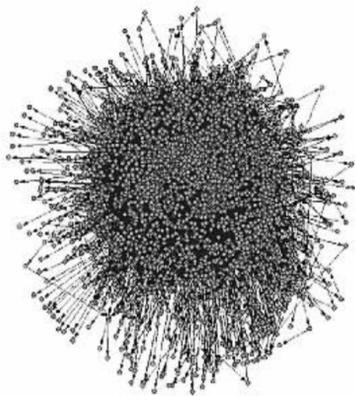
（2）门策拉—阿尔特曼定律：1928年，德国心理学家、语音学家门策拉在研究词和音节的长度关系时发现，随着一个词所含音节数的增加，这些音节的平均长度会减小。他把此种现象概括为“整体越大，其组成部分就越小”。为了用数学公式建立语言学单位间的这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阿尔特曼于1980年对其进行了数学描述，将其精确为“一种语言结构越长，则构成它的成分越短”，即：部件长度是结构长度的函数。

（3）皮奥特洛夫斯基—阿尔特曼定律：如何用数学手段来描述语言中的变化是计量语言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之一。1974年，苏联语言学家皮奥特洛夫斯基等人提出用反正切函数来描述语言的演化规律。1983年，阿尔特曼等人在皮奥特洛夫斯基发现的基础上，结合拉波夫等人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语言演化规律的三种变体。这一定律认为“所有语言变化都是新老形式交互作用的结果”。观察现有计量语言学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目前计量语言学研究的语料大多来自欧洲语言，这种过于注重欧洲语言的现状，对计量语言学

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利的。我们需要用更多类型的语言来验证语言定律的普适性，否则很难把某个定律视为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扩大计量语言学所研究语种的数量与类型不仅有益于发现普适性的定律，也有助于发现每种语言的特殊性。在中国开展计量语言学研究，不但可以更精确地描写与解释汉语的结构特征，而且也可以通过与其他语言的比较，更深入地理解汉语所具有的特殊性与普遍性。更为重要的是，此类研究是真正从系统科学的角度来全面理解汉语系统的基础，对于建立科学哲学基础之上的汉语语言学理论具有极大的意义。

总的说来，开展多层次的汉语计量语言学研究不仅是对国际计量语言学的补充与发展，也有助于提高中国语言学的国际化与语言学的科学化，是一个值得更多语言学家参与的领域。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现代汉语计量语言学”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教授）



汉语句法关系网络图。通过研究此种网络的结构，不仅可以发现语言网络与其他网络的共性，也可加深对人类语言结构及其复杂性的了解。